

国际化、地区腐败与企业绩效

——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陈 砺^{1,2}(副教授), 黄晓玲¹(博士生导师)

【摘要】 针对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腐败问题,以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研究制造业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腐败正向调节国际化程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地区腐败严重情境下,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起初是负向影响,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对企业绩效则呈显著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在地区腐败严重情境下,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关键词】 国际化; 地区腐败; 企业绩效; 制造业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 F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994(2018)02-0019-6

一、引言

企业国际化战略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必然选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从事国际化经营活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随着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各种新经济体和经济现象的出现助长了包括腐败这类投机行为的产生。实施国际化战略是个长期过程,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有何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与研究对象所处的情境密切相关,而以往研究缺乏特定情境。本文针对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腐败问题,考察国际化发展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地区腐败情境下,国际化对不同类型企业绩效的影响,为腐败的宏观经济后果提供微观层面的证据(徐业坤、李维安,2016)。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已有研究认为国际化与企业绩效有正向、负向、U型、倒U型和S型等关系。呈U型关系认为在国际化发展的初始阶段,企业面对陌生的国外环境,成本支出大于收益,当企业适应

并熟悉了环境后,开始扩展国外业务,企业效益提高。呈倒U型关系则认为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企业绩效也不断上升,但国际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协调各业务单元的成本会超出国际化带来的收益,企业绩效因此下降。Zahra、George(2002)认为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初期面对的是新环境,学习效果明显上升,其利用自身潜力和能力在不同条件下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Lu、Beamish(2004)认为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呈S型关系,处于不同国际化阶段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也有多种收益和成本。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尚不明确,主要是因为企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不同,导致结论存在差异。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企业国际化初期会产生协调成本并进行大量投资,获得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新进入成本,从而造成企业绩效下降。直接出口仍然是我国企业最主要的海外经营活动,包括有海外投资活动的企业,基本上还处于国际化初始阶段,只有少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跨国经营,其中少数企业开始进入全球化经营的初始阶段,主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公司治理(环境)、产品市场竞争与股票特质性风险”(项目编号:71262006)

和管理经验,学习成本比较高。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1: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呈U型关系。在国际化初始阶段,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在国际化发展阶段,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2. 地区腐败与企业绩效。现有文献研究中关于腐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尚无一致结论。Aidt和Dutta(2008)、李捷瑜和黄宇丰(2010)在控制了企业和制度因素以及内生性问题后,发现二者具有正向关系,他们认为在市场制度尚不健全的国家,由于相关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和对资源的过度管制,使得企业只能通过腐败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黄玖立、李坤望(2013)认为在经济转型国家中,由于公平竞争机制的缺失,企业会通过贿赂行为直接获得政府采购订单,变相地获取企业发展资源。因此在市场机制不健全或缺乏竞争机制的国家,腐败间接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作用。Bertrand、Djankov(2007)研究了经济转型国家的印度对营业执照分配情况,发现腐败能暂时帮助企业获得国外市场准入资格、缩短审批和检查时间,但会扭曲资源配置。Wang、You(2012)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腐败不是制约公司增长的重要因素,但阻碍了更发达的金融市场的稳固增长。

而腐败对企业绩效具有负面影响的研究,主要以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跨国贸易和经营为对象。Lee、Weng(2013)利用营商环境和企业表现调查数据发现,腐败支出多的企业出口更少,导致经营绩效下滑。Kimuyu(2007)以肯尼亚为研究对象,发现制造业企业用于腐败的支出阻碍了企业出口、降低了企业绩效;腐败在阻碍企业发展程度上是税收的三倍(Fixman、Svensson,2007)。韩冰洁(2011)在跨国公司研究中发现,组织层面腐败会降低子公司绩效;企业寻租腐败支出越多,企业出口越少(刘锦、王学军,2015)。万良勇等(2015)认为腐败会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和不确定性,削弱企业内部控制,扭曲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对非国有企业来说,融资约束会影响企业资金运作和销售业绩,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过高的腐败成本对非国有企业发展影响较大。

腐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结论不同的原因在于腐败的动机和效果有差异。Aidt等(2008)认为腐败的产生与市场化过程中体制和制度建设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和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市场制度需进一步完善。在地区腐败程度较高时,“保护费”式腐败会增加企业成本,“润滑剂”式腐

败有助于企业提高行政办事效率或获取更多稀缺资源。不管动机和效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企业绩效。基于以上观点,本文提出:

假设2:地区腐败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

3. 国际化、地区腐败与企业绩效。Batra和Kaufmann(2003)、Beck和Demirgul-kunt(2005)验证了国际化对企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区腐败程度越高,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越高,从而影响企业绩效。我国腐败与转型经济以及我国制度相关,《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通过一定程序获得市场准入资格。过勇(2007)认为开展国际化业务的企业面临的管制更多,为了顺利进入国外市场,一些企业会以金钱换准入,企业付出的贿赂越多,企业销售增长越快。党力等(2015)从政治关联的角度解释国际化、腐败与企业创新及绩效的关系,认为寻求政治关联和提高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手段,具有政治关联的国际化企业比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更能促进企业短期绩效的提高,但对企业的长期绩效则会产生负面影响。De Rosa等(2010)认为腐败短期可能对国际化企业绩效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中长期是无效率的。而Treisman(2000)则发现更高的国际化程度会导致更少的腐败,长期民主政治会降低腐败程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民主与法治进一步完善,腐败程度会逐步降低,企业绩效会随之提高。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私营经济已成为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力量,但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会失去很多优惠和平等竞争的机会。地区腐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变化,聂辉华等(2014)也认为地区腐败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形式和显著性上有不同的影响。李涛等(2005)根据367家非国有企业数据,得出良好的法制环境对非国有企业成长有利的结论。Wang、You(2012)发现国有企业、内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贿赂的比重依次上升,私营企业中外资股份越高,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大。党力等(2015)认为,腐败对非国有企业的绩效具有负向影响。邓新明(2011)认为民营企业的母国政治关联对国际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政治关联型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在短期对企业绩效具有明显的作用,但长期来看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绩效。

综上所述,地区腐败情境下,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程度不同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结论不同,主要原因在

于不同学者对地区腐败的动机和对国际化发展程度有不同理解。根据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在地区腐败程度较高情境下,企业国际化初始阶段,由于存在学习效应和协调成本支出以及贿赂等非正常市场支出,企业花费的成本远大于收益,从而使企业绩效降低。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民主法治不断健全,企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经营管理经验和效率随之提高,协调各业务单元的成本不断下降。同时由于国际化企业必须遵守国际市场交易规则,此时的国际化企业更能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企业无需再支付贿赂等额外成本,而腐败作为短视行为无法保证企业长期发展,相应地,企业绩效不断提高。对于不同类型的国际化企业,非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和优惠政策方面远不及国有企业,因此在地区腐败程度较高情境下,非国有企业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比国有企业大。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地区腐败正向调节国际化程度与公司绩效间的U型关系。当地区腐败程度较高时,在国际化初始阶段,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在国际化发展阶段,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

假设4:地区腐败正向调节国际化程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在地区腐败程度较高情境下,非国有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和显著性都比国有上市公司大。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从2009~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中选择正常营业并且公开披露海外销售收入的67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了金融类公司、ST公司以及未详细披露信息的公司。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国际化程度数据从上市公司年报和WIND数据库中手工整理得到。经济案件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集体私分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其中贪污和贿赂案件占比最高,占经济案件的80%以上,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地区腐败数据取自《中国检察年鉴》中各省市人民检察院各年工作报告中摘录的贪污和贿赂立案案件数以及公职人员数。选择省级层面腐败数据以消除国别因素干扰,地区腐败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腐败程度越高。

2. 研究变量与模型设计。

(1)企业绩效(ROA)。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主要有三种:一是财务指标,包括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等;二是托宾Q值;三是全要素生产率。托宾

Q值是以公司市场价值除以重置成本来衡量,相关市场不完善,企业重置成本不易获得;根据产出、资本和劳动力数据估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缺少信度。因此,国内外学者研究企业绩效时多采用资产收益率(ROA)指标进行衡量,即用企业净利润占资产总额的比例衡量企业盈利能力,本文也采用此指标。

(2)国际化程度(FSTS)。由于上市公司年报和万得(WIND)数据库披露的企业国际化程度相关数据有限,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仅用国际销售收入占企业总销售收入的比例衡量国际化程度。

(3)地区腐败(CORR)。现有研究对于腐败指标的衡量:一是企业的业务招待费和差旅费;二是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腐败指数(CPI),此方法适合跨国比较,并且易受到调查者文化背景制度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三是根据《中国检察年鉴》公布的相关数据,采用实际腐败案件数、人数或由此导致的经济损失进行衡量(Glaeser、Saks, 2006),也可以采用每万人或每万公职人员中贪污腐败渎职立案数衡量。本文也采用此做法,选取“每万名公职人员贪污贿赂立案数”衡量地区的腐败程度。该指标较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各省和地区的腐败程度和反腐力度,避免了数据缺失和调查数据的主观性。

(4)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财务杠杆(LEV)等于负债比总资产,即资产负债率;成长能力(GROWTH)即营业总收入增长率;企业所有制类型(SOE),用0表示国有企业,1表示非国有企业;企业年龄(AGE)用企业首次注册年份直至各年年数表示;股权结构(HOLD)可能会影响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的关系,本文选择股权集中指标,即用公司前3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表示;创新能力(PATENT)用企业每年专利数表示,本文取其自然对数。

除企业绩效(ROA)、国际化程度(FSTS)与年份外,其他变量均在回归前进行中心化处理。部分上市公司在某些年份的国际化程度为零,说明该公司即将步入国际化初始阶段,该值有意义,因此不做中心化处理。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Hausman检验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整体通过检验。所有回归估计都采用STATA 13.0进行,并控制了年份和企业,使用White检验消除异方差影响。

为了验证前文假设,建立基本模型①~③:

$$ROA_{it} = \beta_0 + \beta_1 FSTS_{it} + \beta_2 CORR_{it} + \beta \sum X_{it} + \alpha_i + \gamma_t + u_{it} \quad \textcircled{1}$$

$$ROA_{it} = \beta_0 + \beta_1 FSTS_{it} + \beta_2 CORR_{it} + \beta_3 FSTS_{it}^2 + \beta \sum X_{it} + \alpha_i + \gamma_t + u_{it} \quad (2)$$

$$ROA_{it} = \beta_0 + \beta_1 FSTS_{it} + \beta_2 CORR_{it} + \beta_3 FSTS_{it}^2 + \beta_4 CORR_{it} \times FSTS_{it} + \beta_5 CORR_{it} \times FSTS_{it}^2 + \beta \sum X_{it} + \alpha_i + \gamma_t + u_{it} \quad (3)$$

其中: ROA_{it} 表示 i 企业在 t 年的绩效; $FSTS_{it}$ 表示 i 企业在 t 年的国际化程度; $CORR_{it}$ 表示 i 企业所在地区在 t 年的腐败程度; $\sum X_{it}$ 为其他控制变量; α_i 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误差; γ_t 表示不随个体变化但随时间变化的误差; u_{it} 表示随时间变化的误差; t 表示年份, 即 2009~2014 年; i 表示 671 家上市公司。

四、实证分析结果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表 1 中企业资产收益率 (ROA) 的标准差大于平均值, 说明不同企业的 ROA 存在差异。企业国际化程度最小值为 0, 显示不存在国际化程度, 在 2009~2015 年期间有的企业从无国际化业务发展到开始国际化业务, 体现了国际化发展的长期性; 标准差大于平均值, 说明不同企业国际化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地区腐败的标准差小于平均值, 说明腐败程度在某些地区比较集中。

2. 多元回归分析。表 2 中模型①~⑤均加入全部控制变量, 估计国际化程度、地区腐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依次加入国际化程度、地区腐败、国际化程度与地区腐败、国际化程度二次项、地区腐败与国际化程度交互项、地区腐败与国际化程度二次项交互项, 验证各种情境下的假设。模型①中国际化程度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部分支持假设 1。模型②中地区腐败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支持假设 2。模型③显示地区腐败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国际化程度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说明企业在

表 2 国际化、地区腐败与企业绩效回归结果

	模型①	模型②	模型③	模型④	模型⑤
FSTS	-0.009 (-1.59)		-0.009 (-1.52)	-0.053*** (-3.43)	-0.054*** (-3.49)
CORR		-0.042** (-2.19)	-0.041** (-2.14)	-0.039** (-2.03)	-0.005 (-0.17)
FSTS ²				0.060*** (3.08)	0.061*** (3.14)
CORR× FSTS					-0.340* (-1.74)
CORR× FSTS ²					0.417* (1.67)
GROWTH	0.014*** (12.29)	0.014*** (12.18)	0.014*** (12.26)	0.014*** (12.11)	0.014*** (12.10)
LEV	-0.139*** (-20.13)	-0.139*** (-20.08)	-0.139*** (-20.12)	-0.138*** (-20.13)	-0.138*** (-20.07)
SOE	0.013*** (3.79)	0.013*** (3.86)	0.013*** (3.98)	0.013*** (4.01)	0.013*** (3.98)
AGE	-0.002*** (-5.56)	-0.002*** (-5.29)	-0.002*** (-5.06)	-0.002*** (-4.89)	-0.002*** (-4.86)
SIZE	0.008*** (5.89)	0.008*** (5.87)	0.007*** (5.85)	0.008*** (5.92)	0.007*** (5.87)
HOLD	0.038*** (4.16)	0.037*** (4.06)	0.037*** (4.04)	0.035*** (3.81)	0.035*** (3.85)
PATE	-0.003*** (-3.24)	-0.003*** (-2.93)	-0.002*** (-2.86)	-0.002*** (-2.70)	-0.002*** (-2.68)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Company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0.023 (1.52)	0.025 (1.67)	0.021 (1.38)	0.023 (1.53)	0.024 (1.56)
观测值	3299	3299	3299	3299	3299
调整 R ²	0.164	0.165	0.166	0.166	0.167
F 值	5.82	5.88	5.84	5.76	5.77

注: 括号内为 t 值, 下同。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关系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ROA	CORR	FSTS	GROW	LEV	SOE	AGE	SIZE	HOLD	PATE
ROA	0.041	0.061	1.000									
CORR	0.130	0.073	-0.029*	1.000								
FSTS	0.185	0.212	-0.040***	0.068***	1.000							
GROWTH	0.208	1.191	0.094***	-0.037**	0.025	1.000						
LEV	0.503	0.198	-0.357***	-0.029	-0.089***	0.034**	1.000					
SOE	0.477	0.500	0.125***	0.119***	0.092***	0.020	-0.163***	1.000				
AGE	15.620	4.757	-0.069***	0.131***	0.079***	-0.015	0.038**	-0.029	1.000			
SIZE	12.950	1.329	0.001	-0.047***	-0.131***	0.040**	0.400***	-0.271***	-0.000*	1.000		
HOLD	0.475	0.159	0.110***	-0.099***	-0.032**	0.096***	0.066***	-0.145***	-0.234***	0.304***	1.000	
PATENT	3.446	1.588	0.035**	0.161***	0.023	-0.012	0.060***	-0.002*	0.099***	0.317***	0.057***	1.000

注: ***, **, * 分别表示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1%、5%、10% 的双尾检验, 下同。

国际化初始阶段,国际化程度较低,对企业绩效影响不大,由于成本大于收益,学习效应和协调成本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以上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2。模型④中国际化程度二次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经过学习后,熟悉了国外经营环境,新进入成本和协调成本降低,对企业绩效开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支持假设1,这也说明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一个长期过程。模型⑤中地区腐败与国际化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地区腐败与国际化二次项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支持假设3,表明地区腐败与国际化程度的交互效应会显著正向调节国际化程度与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假设3成立。

本文进一步将671家上市公司分为国有上市公司(351家)和非国有上市公司(320家)两类,分析不

同性企业国际化程度和地区腐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所用指标和方法与前述一致。

表3中模型⑥和模型⑦分别显示了国际化程度(FSTS)和地区腐败(CORR)对国有上市公司绩效(ROA)的影响,可见假设1和假设2均成立。模型⑧考察了国有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FSTS)和地区腐败(CORR)对企业绩效(ROA)的影响,同样支持假设1和假设2。模型⑨引入国有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二次项(FSTS²),该指标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假设1。模型⑩引入了地区腐败与国有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交互项(CORR×FSTS)和二次项交互项(CORR×FSTS²),结果表明地区腐败与国际化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部分支持假设3,与国际化二次项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影响为正但不显著,部分支持假设3。两个

表3 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际化、地区腐败与企业绩效回归结果

企业类型	国有上市公司					非国有上市公司				
	模型⑥	模型⑦	模型⑧	模型⑨	模型⑩	模型⑪	模型⑫	模型⑬	模型⑭	模型⑮
FSTS	-0.023* (-1.93)		-0.022* (-1.80)	-0.073*** (-3.51)	-0.029 (-1.10)	-0.015* (-1.95)		-0.014* (-1.78)	-0.040* (-1.79)	-0.006 (-0.20)
CORR		-0.133*** (-2.84)	-0.129*** (-2.75)	-0.0158 (-0.64)	-0.104* (-1.65)		-0.077*** (-2.63)	-0.073** (-2.50)	-0.072** (-2.48)	0.105 (1.41)
FSTS ²				0.099*** (3.70)	0.070** (2.12)				0.035 (1.24)	0.003 (0.10)
CORR×FSTS					-0.196 (-0.64)					-1.135*** (-2.97)
CORR×FSTS ²					0.204 (0.53)					1.438*** (3.13)
GROWTH	0.013*** (7.65)	0.013*** (7.74)	0.013*** (7.62)	0.015*** (8.82)	0.013*** (7.70)	0.014*** (8.48)	0.014*** (8.24)	0.014*** (8.37)	0.014*** (8.19)	0.014*** (8.06)
LEV	-0.146*** (-11.46)	-0.144*** (-11.32)	-0.145*** (-11.40)	-0.137*** (-14.97)	-0.143*** (-11.24)	-0.143*** (-13.92)	-0.143*** (-13.95)	-0.144*** (-14.02)	-0.144*** (-14.01)	-0.128*** (-9.17)
AGE	-0.003*** (-3.04)	-0.002* (-1.67)	-0.002* (-1.88)	-0.001** (-2.50)	-0.002* (-1.68)	-0.003*** (-4.97)	-0.002*** (-4.60)	-0.002*** (-4.50)	-0.002*** (-4.46)	-0.004*** (-4.04)
SIZE	0.011*** (2.86)	0.011*** (2.89)	0.010*** (2.84)	0.008*** (2.04)	0.011*** (2.90)	0.009*** (4.11)	0.009*** (4.22)	0.009*** (4.22)	0.009*** (4.25)	0.005 (4.09)
HOLD	0.069*** (3.08)	0.069*** (3.07)	0.071*** (3.16)	0.022* (3.66)	0.070*** (3.10)	0.049*** (3.76)	0.048*** (3.72)	0.048*** (3.74)	0.047*** (3.68)	0.043** (2.00)
PATENT	-0.006*** (-3.21)	-0.005*** (-3.08)	-0.006*** (-3.17)	-0.003*** (-3.02)	-0.006*** (-3.19)	-0.002 (-1.38)	-0.001 (-1.92)	-0.001 (-1.82)	-0.001 (-1.74)	-0.003 (-1.63)
Year	yes	yes								
Company	yes	yes								
CONS	0.009 (0.22)	0.025 (0.61)	0.022 (0.55)	0.018 (0.95)	0.024 (0.59)	0.023 (0.65)	0.014 (0.55)	0.016 (0.64)	0.017 (0.68)	0.105** (0.52)
观测值	1695	1695	1695	1695	1695	1604	1604	1604	1604	1604
调整R ²	0.160	0.168	0.146	0.152	0.153	0.153	0.170	0.156	0.156	0.159
F值	6.15	6.24	6.19	6.04	5.97	5.13	5.13	5.06	5.03	5.03

交互项与国际化程度主效应符号一致,表明国际化与地区腐败的交互效应会正向调节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假设3成立。需要注意的是,模型⑨和模型⑭中引入国际化程度二次项(FSTS²)后,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在国际化发展不同阶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向一致,但国有上市公司在国际化程度较高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比非国有上市公司显著,这与国有企业有政府政治关联有关。模型⑩和模型⑮的结果表明,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地区腐败与国际化程度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地区腐败与国际化程度二次项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支持假设3。而国有上市公司两个交互项均不显著,支持假设4,即在地区腐败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非国有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比国有上市公司大,地区腐败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影响更显著。

3. 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混合效应模型以及将ROA换成ROE,重新检验了所有模型,主要估计结果无显著变化,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针对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腐败问题,分析了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①在国际化初始阶段,企业国际化程度较低,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随着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在国际化不同发展阶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向一致,而国有上市公司在国际化程度较高阶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显著。②地区腐败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地区腐败程度越高,越阻碍企业发展。并且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地区腐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越小。③地区腐败与国际化程度交互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负,与国际化二次交互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正,尤其是两次交互效应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显著。

虽然腐败是转型经济国家市场化进程不断提升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有效反腐与全面深化改革要同时进行,应在减少地区腐败的同时进一步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一方面要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强化监督机制,提高腐败成本,以薪养廉,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营造健康的制度环境和体制环境;另一方面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以市场为

主导,充分发挥市场自我调节作用。要逐步培育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源头上杜绝腐败行为的产生。各地方政府要鼓励企业积极开展研发活动,帮助企业实现国际化、跨国经营和全球化发展的长远目标,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中央政府要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在反腐败工作上进行具体指导和帮助,进一步降低地区腐败程度。对于各类型企业,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才是其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素,也是企业“走出去”发展国际化业务、不断做大做强的第一生产力。

主要参考文献:

钟昌标,刘伟.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一个文献综述[J].国际商务研究,2016(3).

徐业坤,李维安.腐败:私有投资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2).

Aidt T., Dutta J., Sena V.. Governance regimes, corruption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8(2).

李捷瑜,黄宇丰.转型经济中的贿赂与企业增长[J].经济学(季刊),2010(7).

黄玖立,李坤望.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J].经济研究,2013(6).

Bertrand M., Djankov S., Hanna R.. Obtaining a driver's license in India: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studying corruption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4).

Wang Y., You J.. Corruption and firm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2).

刘锦,王学军.寻租腐败与中国企业出口:促进还是抑制?[J].国际经贸探索,2015(3).

邓新明,熊会兵,李剑峰等.政治关联、国际化战略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14(1).

党力,杨瑞龙,杨继东.反腐败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2015(7).

聂辉华,张彧,江艇.中国地区腐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14(5).

作者单位: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北京100029; 2.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0